

恭王府考

红楼梦背景素材探讨

周汝昌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恭王府考

——红楼梦背景素材探讨

周汝昌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恭王府考

——红楼梦背景素材探讨

周汝昌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上海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4.75 捆页 4 字数 118,000

1980 年 6 月第 1 版 198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统一书号：10186·198 定价：0.67 元

卷 端 紊 语

读者同志：当你拿到这本书，或许不免心头泛起一种惊讶之感。

可能你还记得，姚文元写过一篇指名攻击周扬同志的“文章”，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到了一九六一年、六二年，你们不是连续发表了成百万字的曹雪芹死年考证，祖宗考据，大观园地址考据……等等奇谈怪论，登了整版整版的稀奇古怪的地图，为胡适派唯心论实行了一次大复辟吗？”

先说，这里面包含着一种“新兴”的“四人帮”文风，此文风逐步发展，流毒至深至广。他讲到了奇谈怪论。那诚然是“自古已然”，不过又毕竟是“于今为烈”，——姚文元的这类言词，在所有的奇谈怪论中都堪称独步。他张口说是“成百万字”，这纯粹是胡说八道，那时是准备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他所举的那几种考证，各种报刊加起来，充其量也不过二三十万言，哪里来的“成百万”？何况，就是真成了百万，对我们纪念这位值得我们九亿人民的中华民族骄傲的伟大作家来说，难道不该？到底是什么使得姚文元为此而如彼其大惊小怪，岂非异事？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卒，也不该弄个清楚，这又是哪位先哲定下过的法令？假如但丁的“死年”有了问题，意大利人民和学者要试行研究就是犯罪，而对此“不准考证”的才是最“科学”或者最“革命”吗？人是猿变的，这个结论今天连小孩子都知道，获此结论那不知花费了多少科学家研究者的工夫，恩格

斯既然也写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看来他似乎不把“祖宗考据”当作“唯心论”。毛泽东同志嘲讽过“言必称希腊”，自己的祖宗，“对不起，忘记了”。从人类到国家、民族，都需要考据一下祖宗。个人呢，就拿姚文元作例子，他的祖宗，他自己未宣，今日举世皆知，是靠了愤怒揭批“四人帮”的人民群众，作出的一个精彩的“祖宗考据”。这种考据，恐怕只有姚文元说它是唯心论。

至于大观园，问题当然要别致一些，就说应当言称希腊吧，无奈希腊没有这种类似的事物，因此姚文元就可以越发振振有词，“大复辟”呀，什么呀，那简直吓人极了。

毕竟为什么大观园不准有遗址？又为什么不准对有无遗址进行考据？姚文元统统没有说，——当然在“四人帮”的法律上，这根本也不用说。不过，看上去那种装扮得倒颇像热衷于捍卫唯物主义的姚氏黑文，所播散的实质倒正是彻头彻尾的唯心论。

跟“四人帮”争这些，无论如何也不免于书呆子气，因为他们搞的是如何篡党夺权，殃民祸国；大观园的短长，何尝真懂，不过借题而已。但是他们曾经披着马克思主义者的外衣，惯于吓唬乡下人，既然提的又是唯心论的大是大非问题，自然也曾耸动一时之耳目。姑且就唯心唯物而言，恩格斯的话，不啻晨钟暮鼓，总会回旋于我们的耳际，请听：

“……首先我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致保·恩斯特）

“……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

主义者’的；这的确也引起过惊人的混乱。……”（致约·布洛赫）

恩格斯哪里想得到，像“四人帮”这一类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引起的混乱，又岂止“惊人”而已！他们的一贯的方法，正是到处以公式来剪裁历史事实！

我在这里，要批驳申明的只是，“大观园地址考据”本身，并不是什么“大复辟”。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为我们恢复了学术考据、研究问题的自由，“百家争鸣”的春风吹绿了无边广阔的祖国文化园地。就是说，考据大观园无罪。至于我个人的考据如何，那完全是另一问题。它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也可能完全错了，这另当别论，任何问题的研讨都有赖于同志式的切磋，学术观点的不同，是推动研究事业的必要的力量之一，是非正误，靠广大读者群众来审断，靠历史时间的实践来检验，而决不是姚文元滥加于人的政治罪名所能定谳。

这册小书，不是“茶余酒后”的“谈助”之类，也不是“旅游指南”“名胜介绍”的性质。我愿望上想做的，是一种尽管文字可以不必太死板枯燥、而内容仍然是严肃认真的学术论证，我做不到理想的地步，是自己水平能力的事，但总是抱着负责任的态度，并且觉得还可以不断努力，以期有所前进，有所发现。

恩格斯对保·恩斯特说过：

“您把整个挪威和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归入小市民阶层的范畴，接着您又毫不迟疑地把您对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看法硬加在这一挪威小市民阶层身上。这样一来就有两个事实使您寸步难行。……”（着重点原有）

“……同时，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妇女比起德国的小市民妇女来，也简直相隔天壤。例如易卜生的戏剧不管有怎样的缺点，它们都反映了一个即使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但是比起德国的来却有天渊之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

格以及首创的和独立的精神，即使在外国人看来往往有些奇怪。因此，在我对这类东西作出判断以前，我是宁愿把它们彻底研究一番的。”

这和《红楼梦》并无直接关系，和大观园更是牵扯不上，重温一下，为的是看看真马克思主义者和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气味是如何地不一样。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习真马克思主义学得好一点，才能在遇见假马克思主义时不被它轻易欺骗。

絮语打住，现在就请翻到下一页，看“大观园地址考据”吧。

DZ5/30

目 次

卷端絮语	1
小引	1
一、推考的经过	4
附录(一项)	6
二、意见的商量(之一)	17
三、意见的商量(之二)	20
四、论证的增添	22
(甲) 史料探研	22
附录(二项)	29
(乙) 三者即一	34
附录(四项)	47
(丙) 旧巢新燕	55
附录(一项)	64
(丁) 玉河引水	66
附录(一项)	76
(戊) 西涯南湾	85
附录(二项)	90
(己) 残痕依约	102
附录(三项)	107

(庚) 一巷之隔	117
(辛) 证后馀谈	120
附录(一项)	124
附记三点	125
结语	131
附编：《曹雪芹之家的一处园宅试探》(徐恭时撰)	134
补记	139

小 引

“《红楼梦》是部小说，——能会真有个大观园吗？”

对于这个问题，有过、也还会有各种不同的回答。如果对这些回答采取大分类法来归纳，则不外两类：即，有人说无，有人说有。

说无，就是认为：小说是编出来的，哪里有个真地址？或者提得更理论化，说：文学作品是艺术概括，作者是观察了很多府第园林而提炼创造出来的，不会有“大观园遗址”（并认为，如谓真有，那是很错误的）。

说有，则是以为：对具体问题永远需要具体分析。《红楼梦》跟《西游》、《水浒》用的是不是雷同的创作方法？“一座险恶林子”，“一处村舍人家”，往往再没有、也不需要其它细节了，为写“倒拔垂杨柳”的菜园子，毕竟又是观察了多少的菜园子，作了何等的概括？我们的古典戏曲、小说里写出一个“后花园”的，为数不是很少，《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写来为何并不与它们类似，或给读者以差不多的印象？所以事情最好分别而论。艺术概括，指的正是对素材的选取、运用、加工，而并非是说没有素材，不要素材。选取、运用、加工的手法，不同作家，不同情况，也并非一成而不可变。说“有”大观园，就是说，二百几十年前的曹雪芹既然以一个大府园为小说环境背景，他是选取运用了一个基本素材作为骨干而进行加工概括的，这个基本素材是他认为最合宜、最便于他的写作的。考察研究这个基本素材，对更好地了解曹雪芹的艺术手法的特点和造诣，必然有其意义。

我的看法属于这后一种。

其实，文学的集中概括，主要指的是社会生活现象，矛盾冲突斗争。毛泽东同志说：“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看得也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说得本来十分清楚。主张曹雪芹在写大观园时并无一个地点可言的理由，却是说，他“不知观察了多少府邸园林才概括出这个府园来的”。这只能说是一种推想。在历史事实上，即十八世纪的作家那里，可能是这样，也可能不是这样。集中概括，对写人物、写事件，本也不等于具体地条列出了一个死法或公式，更何况涉及到如何写一个府园的问题上。以此作为理由来判定曹雪芹在这一点上的艺术方法，是否真能得历史之真相？会不会像恩格斯在讲唯物主义方法时说的，按照一个公式去“剪裁历史事实”那样，也把现实主义方法当了公式而“剪裁”了曹雪芹的艺术创造过程呢？

生活素材，艺术概括，这个道理原是古今中外的普遍真理，曹雪芹一方面实践着，但这不会就是他采用了和高尔基一模一样的方法。我觉得他的“真事隐去”“假语存焉”的背后，已然包括着他自己艺术概括的独特手法的道理了。

以上是就艺术方法来理解。“真事”与“假语”的关系，当然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

曹雪芹明告读者，他的小说有真假两面，他有意地把“真事隐去”，其目的却正是为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更好地传写真事，“假话”是手段。我们只要不太糊涂，当然不会把这样的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弄颠倒。比如他特别指出“只是朝代年纪失落无考”。是真的“无考”吗？谁也不这般天真。“无考”正是提醒读者实际上“有考”。要不，他何必啰嗦？他越要“传”的，越需要先“隐”一“隐”。“朝代年纪”是如此，“邦国輿地”又何尝不如此？——如《甲戌本》“凡例”所言，他一定不肯明写“京”的“东”“西”“南”“北”，而实际上又暗示得

十分清楚，那是“大都”北京。所以，“诗后便是此石坠落之乡，投胎之处”，这里面就不会没有“隐”去的实际。试看他将荣国府园一面写得那等的细致清晰，一面又故设一些恍惚迷离的“障眼法”。须知，曹雪芹用“梦”“幻”字样，写“梦景”“幻境”，并非一般“虚无”“缥缈”之义，而正是给他要写的“实境”加上的巧妙掩盖，大观园忽而又有点像“太虚幻境”，忽而又被题作什么“天仙宝镜”，忽而先在“甄士隐”梦中一闪，忽而后在贾宝玉梦中一现。其道理即在于此。“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曹雪芹首先在“牌坊”上大书特书的这副对联，说的正是这个。难道其用意还不清楚吗？

再举个例，比如曹雪芹他写“真真国”的女诗人，大家都以为“真真国”者，不过是一个虚无缥缈之乡，无非为小说点缀生色而已，而其实，只略加考证就清楚说明他的笔下是实有其地，绝不是什么“虚构”的产物，“真真国”指的是哪里？意义何在？可参看《红楼梦新证》页二三六至二三七。举这个例，是说明连“真真国”都有实指，那么作为全书“主题”的荣国府，恐怕不会反而像胡适说的“大观园本无其地”吧。

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层，不对这部具体小说的具体特点作具体的分析，就会只在一些假象上浮光掠影，容易满足于最一般的认识和谈论，却自以为真理尽在于斯，那岂不正是丢失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一、推考的经过

开门见山：我是主张，曹雪芹的荣国府大观园，有其实际地点的基本素材作为蓝本，这个地点即相当于北京什刹海（前海）稍西的恭王府。“恭王府”是清朝最晚期的一个名称，我们意中的实指，当然是说这个府园在雍、乾之际的那一处“前身”。

三十多年前，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看《红楼梦》，也看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看到《梦辨》中有关地点问题的某些论点，自己也有些想法。于是反覆寻绎小说本身中的叙述手法和各种线索，确实感到《红楼梦》所写地点有所实指，且很具体。就想推考其大致的座落所在。第一步范围划到了北京内城西北一带。第二步再推，是在德胜门内，可能离护国寺等地点应不会太远（参看《红楼梦新证》，旧版页一三三至一四三；新版页一四一至一四六）。那时，我因本不是“老北京”，城中了无亲友熟人，没有寄宿歇脚之处，一年也难得进城一趟，进城坐校车，也只在终点“青年会”下车（即今北京市东城区体育运动委员会所在），附近办点必要之事，还得掐着时间赶紧趁校车回去。因此，什么地方也无有游览之便，全不熟悉。手中只凭一张当时流行的普通北京地图，“纸上谈兵”，根本不知道什么恭王府。

迨到推考过程中范围圈一步步缩小，划到护国寺左近时，一次和同学谈起，他告知我说，这个地点正有一个什么府。我听了大为兴奋。后来打听明白，那是旧日的恭亲王府，当时是辅仁大学的一部分，府的后面还有一个园子。

一处大府邸，还有一个园子？我简直惊奇极了！

一九五二年入蜀，一九五四年回到北京。我回京后接到的第

一封信就是辅仁大学数学系的魏庚人教授的惠函，他说：“读了您的考证地点的文章，很感兴趣，而我们学校本部东面的一处分部即恭王府，我现在发现其建筑布局与您书中的《荣国府想象图》很吻合。又听老工友讲，多年在这里的人都说我们这儿就是大观园……。这很值得注意。您如有兴趣，请来一看。”〔第二函并示知星期几有空，可预先联系，等情〕（以上是大意，因原函未能检得，俟补。但其基本内容我记忆清楚。）

有的朋友，在过去这些年，偶尔也向我提问：“你还相信恭王府就是大观园遗址吗？”我答：“还是相信。”朋友笑道：“人家说你是搞附会呢！”（他没说“大复辟”，可能是讲话的艺术。一笑。）我说：“人家这样议论，说是附会，我岂敢说不是。但附会也者，是把明知两不相干的事物，硬拉扯在一起；或者是早闻风影，明知无稽，有意牵强坐实。而我当年作推考，只是从小说的内证，推出了一个大致的范围圈。”并且说明：“我们的推断，就到此为止，再要穿凿，便又成‘某街某坊派’了。然而，跟着就发生‘四惊奇’：在我悬拟的范围圈内，真的正有一处第宅府邸，一惊奇。这个府邸后面，正有一个园子，二惊奇。这个府邸的建筑布置，正与我纯据小说描叙而画出的想象图吻合，三惊奇。而这一处府园，其久居于此者本就认为‘这儿是太观园’，四惊奇！——这对我都是以后辗转而来的新闻奇迹，简直不敢置信！‘附会’二字，于我何有？这顶桂冠，怎么加到我头上的呢？”

朋友笑了。我接着说：“若说是出于‘巧合’，一层巧，两层巧，或不希奇。不过谁听见过有这样的四层巧都恰好重叠在我原来的推考上？——这实际上是五层‘巧合’呢！这用‘附会’来解释，是否真能说明问题的实质？合理的思考应当是，这种奇巧的现象的背后，恐怕隐盖着值得注意的道理。”

我又说：“你再听我讲一点。我接到魏庚人先生来信后，急切不能抽身，不久便患病，进了医院，开刀剖腹，卧床甚久，从此健康

坏了，长期恢复不起来，再加上别的原因，我竟然始终未能应魏先生的邀约，践此良约。每一思及，辄为耿耿。直到六十年代初，想‘一进荣国府’，已很不容易，后来费了很大的事，才辗转烦人带领引入一观的，而那时园子已被割裂成几部分，并且一个什么工厂‘办’到园里去了。我一共实在费了三次手脚，才把府园的主景‘分批’看了一下。请问你，我这种样式的‘附会’，恐怕也是世界上少有的吧？”

附录

《红楼梦新证》(增订本)

第四章《地点问题》(录第一、第二两节)

第一节 南北东西

过去的考证，对于地点问题，也分成两派：一是辩论《红楼梦》所写是南抑是北，一是考察大观园是在某街和某坊。前派的代表，可推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这本书里有专章讨论这一问题，极为详细，但结论是以下几句话：

“所以说了半天，还和没有说以前，所处的地位是一样的。我们究竟不知道《红楼梦》是在南或是在北？绕了半天的弯，问题还是问题，我们还是我们，非但没有解决的希望，反而添了无数的荆棘，真所谓‘所求愈深，所得愈寡’了！”

这一段话似乎是给一切后来者下了“此路不通”的警告。

其实南北之争，本不成其为问题，《红楼梦》一开头写姑苏、写维扬——两个全是曹寅先后仕宦的地方——是引子。一入正文，黛玉入贾府，即是从姑苏进京，根本并未正面写过南京只字。问题的缠夹，似乎即在《红楼梦》之所以谓“京”，未标明是“南”是“北”，所

以引起争辩。殊不思单文独用的“京”历来就是首都的称呼；而且我们还有小说的本文为证，两条例子就把问题从基本上说清了：

“探春等却都晓得是议论金陵城中所居的薛家姨母之子，姨表兄薛蟠，倚财仗势，打死人命，现在应天府〔按即南京〕案下审理，如今母舅王子腾得了信息，故遣人来告诉这边，意欲换取进京之意。”（第三回）

“刚说着，只见林之孝家的进来说：江南甄府里〔第二回，贾雨村说：“金陵城内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甄家。”〕家眷昨日到京……一语未完，果然人回：甄府四个女人来请安……贾母便问：多早晚进京的？……这些年没进京，也想不到今年来，四人也都笑回道：正是，今年是奉旨进京的。”（第五十六回）

请问南京城里的薛家、甄家，他们进的“京”再不是北京，难道南京人还要再进南京？除非我们胡涂得像陈锺麟写《红楼梦传奇》，在《枉判》、《妒月》二折里把贾家写成金陵，而反把薛家写作北京城里。第三十三回写宝玉被毒打，贾母生了气，说“我和你太太，宝玉，立刻回南京去！”贾母如本在南京，如何还“回南京去”？《甲戌本》的《凡例》第二条说：

“书中凡写‘长安’，在文人笔墨之间，则从古之称；凡愚夫妇儿女子家常口角，则曰‘中京’，是不欲着迹于方向也，盖天子之邦，亦当以中为尊，特避其‘东’‘南’‘西’‘北’四字样也。”

这是又明白逗漏，又故布疑阵，然而已经是清楚地告诉我们所写就是北京了。第一回在“昌明隆盛之邦”一句旁边，有脂批说：

“伏长安大都。”

这里“长安”还是“首都”的代用词，也正即上文所谓“从古之称”；但“大都”还不是北京的明白话么？第五回宝玉对警幻说：“常听人说金陵极大”，下批云：

“‘常听’二字神理极妙！”

这分明说出宝玉在几岁时就回到北方，根本并不记得南京，只不过常听家中上下时时提念“金陵原籍”“南边老家”的情形而已。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则在红梅、翠竹、湘帘、土炕方面葛藤不已，便觉无谓了。况且说《红楼梦》小说中有时不无借南土风光以点缀生色，是一回事；说写了一点梅竹和其它名物之类就等于是小说地点在南方，是另一回事，二者应该分疏清楚才行。

大前提定下来，再向《红楼梦》小说中看看细节线索。

第十八回，元春归省，分咏大观园景物，宝钗一首七律题作《凝辉钟瑞》的，开头便说：“芳园筑向帝城西。”

第二十四回，贾芸先还了倪二银子，又拿了五十两，“出西门，找到花儿匠方椿家里去买树。”所谓西门，不是西直门，便是阜成门；花儿匠彼时确多在西南郊。

第三十二回，“正说着，有人来回说：兴隆街的大爷来了。”北京共有五个兴隆街：一在东郊，三个都在外城，只一个是内城的，是现在和平门以北，南通大栅栏，北通横街二条，也是西城。又在内务府会计司与慎刑司之间，有兴隆寺和兴隆胡同，还是西城。

第五十七回，邢岫烟回答宝钗把棉衣服当在哪里了，说：“叫作什么恒舒，是鼓楼西大街的。”这条大街，由鼓楼直奔西北，接近北京最西北处。

第十七回，叙妙玉的出身，“去年随了师父上来〔指从苏州进京〕，现在西门外牟尼院住着。”

第八十回，叙宝玉“次日一早，梳洗穿戴已毕，随了两三个老嬷嬷坐车出西城门外，天齐庙烧香还愿。”这个西城门，或亦即贾芸所